

清华口述史

赵丽明 主编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中国文史出版社

清华口述史

赵丽明 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华口述史/赵丽明主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 - 7 - 5034 - 4075 - 5

I. ①清… II. ①赵… III. ①清华大学—校史 IV. ①G649. 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33416 号

责任编辑: 殷 旭

封面设计: 欧阳春晓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

印 张: 28 字数: 418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清华大学中文系赵丽明教授是中国女书研究专业委员会主任，曾因对女书的抢救性工作而蜚声中外。在清华迎接百年校庆期间，在她主讲的《女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中，组织学生开展了以“百年清华人与中华民族振兴”为主题的口述史访谈活动，访谈的对象大多是已离退体的清华老教授，对他们的访谈带有抢救性质；也有年过花甲甚至古稀尚在一线拼搏的学科领军人物。从访谈的结果看，是一次成功的教学活动，也是一项可以载入清华史册的口述史研究成果。

说是成功的教学活动，首先是口述访谈活动作为课程的有机组成，有着明确的教学要求：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首要的是“传承人”，传承人的文明成果，特别是精神文化成果。此次是借清华迎接百年校庆之机，让同学们从身边做起，从老一辈清华人身上了解和梳理清华和相关学科的发展史以及清华人为此做出的奉献和所体现的精神文化。同时，访谈工作纳入课程教学计划，有明确的操作流程和规范；在老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学们的工作十分认真，采访前做了大量的案头资料工作，列出并事先向被访者提交了详尽的采访提纲。采访时与受访者签订了访谈协议书，采访后进行了一稿、二稿、三稿的修改，经受访者修改认定签字。最后提交的作业包括访谈时间、地点、对象、访谈者，整理者；访谈对象介绍、访谈内容、感想体会以及珍贵的受访者提供的照片、资料图片等。同学们为有机会与德高望重的老清华人进行面对面的访谈交流，了解他们艰苦有为的创业史，感受他们的高尚境界与人格魅力，而感到十分荣幸和深受教育。认为不仅受到一次具体的口述史工作训练，感到“很庆幸选择了这门课，因为这样的经历、这样的体验才是我在大学最希望得到的。”而且，认为这是两代清华人心灵的交流和感召。认识到“选择了清华，就是选择了一生的责任”，表示要将老一辈身上体现的清华精神“发扬光大，薪火相传，做历史的保存者，做精神的继承人”，“要向老一辈清华人学习，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做一名合格的清华人！像他们一样，为祖国，为人民，奉献自己的一生！”在每份访谈报告结尾处，同学们都表示收获是多方面的，是十分珍贵的，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这些表明了是一次成功的教学实践。

同时，访谈的成果为清华校史和清华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近几年我一直在做清华文化的研究，基本上是依靠已有的文字材料，未能进行这样鲜活的口述史采集和整理工作，据我所知，清华口述史研究工作的开展是很不充分的。所以当赵丽明教授向我谈起要通过课程，组织学生开展清华口述史研究工作

时，我立即表示支持，认为这不仅是发动学生进行自我教育的好途径，也可弥补清华开展口述史研究工作的不足。事实表明，这两个目的都达到了。应当对赵老师、对满腔热情接受访谈的老教授们、对全体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学们表示我的敬意和谢意！希望这项工作能够继续下去，不断改进，不断积累。

胡显章
2010年国庆节

目 录

人 文 日 新

路，靠自己摸索

——访历史系何兆武教授 / 3

学问“长”在生命中，生命“活”在学问里

——刘桂生教授访谈 / 15

我在清华六十年

——钱逊教授访谈 / 23

清华中文系的复建元老

——赵立生教授访谈 / 36

忆清华岁月，伴人文日新

——访孙殷望教授 / 41

不可遗忘的五十年

——访外文系程慕胜教授 / 54

蒋隆国教授与百年清华

——蒋隆国教授访谈 / 64

自由学术 微笑耕耘

——萧家琛教授访谈 / 77

细数四十年清华点滴

——方琰教授访谈 / 87

经管学院巨大贡献者

——赵纯均教授访谈 / 94

有一种丰富叫简单

——访廖元秋副研究员 / 97

胸怀理想，奋斗不止

——访法学院王兵教授 / 108

我和清华的六十年情缘

——李学勤教授访谈 / 128

三十年文科崛起，一百年清华希望

——胡显章教授访谈 / 133

致知格物

数学，是美的最高境界

——萧树铁先生访谈 / 151

清华数学的重建者

——萧树铁教授访谈 / 162

当一颗“螺丝钉”

——物理系丁慎训教授访谈 / 172

跌宕一生，奉献清华

——访何其盛教授 / 182

温暖，在四月的清华园

——郑用熙教授夫妇访谈 / 203

生命，融于祖国的核能事业之中

——钟大辛教授访谈 / 218

服务会员，服务学校，服务社会

——郭聚豪研究员访谈 / 228

“千条江河归大海”

——访吴麒教授 / 238

少有所为，老当益壮

——访周广业教授 / 246

所谓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清华大学黄克智教授访谈 / 256

清华工作六十年

——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惠坚教授访谈 / 266

天工开物

交叉学科的开路先锋

——中国科学院院士自动化系李衍达教授访谈 / 277

广纳博采，信坚行笃

——访李广信教授 / 290

电子巾帼，科研将才

——丁晓青教授访谈 / 301

永远的清华人

——顾廉楚教授访谈 / 311

活泼健康的老人

——倪维斗教授访谈 / 321

清华电子成长的见证人

——陆大钧、杨为理教授访谈 / 328

智能交通第一人

——史其信教授访谈 / 338

拜访有着巨人身影的凡人

——徐旭常教授访谈 / 347

与清华共成长

——雷志栋教授访谈 / 356

“老北京”的保护者

——建筑学院朱自焯教授访谈 / 365

与清华电机的不解之缘

——钱家骊教授访谈 / 378

给予也是一种爱

——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访谈 / 387

可持续道路上不落的太阳

——钱易院士访谈 / 403

风雨飘摇砥砺坚毅非凡

——温诗铸院士访谈 / 415

结缘清华，一生无悔

——电机系杨津基教授访谈 / 424

附：

百年清华赋（一） / 432

百年清华赋（二） / 434

后 记 / 436

人文日新

路，靠自己摸索

——访历史系何兆武教授

访谈时间：2010年5月18日、2013年12月1日

访谈地点：何兆武教授家中

被访者：历史系何兆武教授

访谈者：黄凯（法82）、李沛霖，张琰、赵丽明教授

整理者：黄凯、李沛霖，张琰

何兆武，原籍湖南岳阳，1921年9月生于北京，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清华外文系读研究生（当时三校的研究院未并入联大）。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口述《上学记》等。



2010年5月，一个春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有幸拜访了历史系老教授何兆武先生。访谈过程中，何老先生的谦逊随和、乐观开朗，深深感染了我们；他的渊博学识更是让我们受益良多。



何兆武先生早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一生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以及解放后三个不同的时期，阅历非常丰富。在迎接清华百年校庆之际，我们通过拜访，向大家介绍何兆武先生与清华结缘、将事业

奉献给清华的独特经历，同时也借此向与何老先生一样为清华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贡献的所有人致敬。

听何老讲解放前

黄：何老师，您看上去脸色很好，非常健康。这和您的生活经历肯定是分不开的。

何：我是1921年出生的，现在89周岁半（2013年92岁）了。我的生活经历了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北洋政府的年代，我出生是在国民党政府之前，1921年。直到1928年，国民党政府北伐把北洋政府推翻了，国都由原来的北京迁往南京，这便是第二个时期。之后就是第三个阶段，我们大家都知道解放前和解放后的两个时期是很不一样的。

黄：对，解放前和解放后是有很大的区别，主要是政治体制变了，对吗？

何：其实在我的感受中，解放前的两个时期也有很大的不同。国民党之前，是以西方（比如英美）的方式来组织政党的，是仿照西方的模式。后来，孙中山觉得那样的方式不行，改组国民党，改为以俄为师，以苏联为师，所以后来国民党的体制就不是西方的体制，而是苏联的体制。国民党一党专政，我们知道西方体制不是一党专政，是通过多党竞选的方式执政，民众可以自由选择。苏联当时是一党专政，是共产党专政，亦即以俄为师。所以孙中山强调：以后不以俄为师，革命就断无成就。也就是说，如果不向苏联学习，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所以后来国民党来了之后，给人的印象也很深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做小学生的时候，是北洋时期，就没有后来的那些东西，比如：课堂和教室上都挂着孙中山像、孙中山遗嘱，就像后来文革时期的最高指示那样。每个星期一早晨的第一节课就是总理纪念周，要背诵总理遗嘱，就跟文革时我们背最高指示一样。国民党完全是模仿苏联的模式，包括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国民党特务的头子有很多都是留学苏联的，学的是苏联那一套。北洋时期，形式上说是西方的民主制，实际上也不是。

中国有中国的特色，中国是封建制国家，封建势力是很雄厚的，这一点是很不同的。北洋时期是军阀专政，只要军阀有实力、有军队就可以控制一方。比如张作霖在东北，实际上就是东北王，但是名义上叫大帅。所以当时实际上是分裂为很多地方势力，而谁占领了北京，谁就是中央政府。也有国会，也有两院——众议院和参议院。记得宣武门原来有两栋西式的楼现在已经拆掉了，那条街原来就叫国会街。众议院和参议院，不过都是形式而已，实际上都是军阀专政，像张作霖，后来实力大了，占领了北京，实际上就是张大帅专政。那些军阀所关心的都只是想占地盘发财，并不关心政治文化的建设。

黄：也就是说不关心民生建设？

何：主要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形式上也有教育部，但实际上是在教育上

留下了一个空白。在文化领域的干涉也不太多，有的干涉也很原始，看谁不满意就抓人，关起来。但是平时根本没有什么意识形态的教化。所以我上小学的时候，所受到的教育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的教育（三人都笑起来），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的口号是什么吗？是“自由、平等、博爱”（这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口号）。国民党不要这些口号。

李：好像孙中山也说过这些？

何：那是早期了，晚期已经不是这些。晚期我们是背总理遗嘱，那时候国民党完全是一个革命姿态的党，是一个完全以苏联为榜样的党。所谓革命党，就是一党专政：“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可是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是蔡元培先生从西方搬来的那一套“自由、平等、博爱”。那时候才读小学二、三年级，但印象很深，到了老年也未忘记。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的国文课，学的那篇《最后一课》，你们知道它吧？

李、黄：知道，法国的。老师给他们用法文上了最后一课。我们都学过。

何：我们学的都是这些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课文。这个倒不是因为军阀多么开明，或者多么仁慈，他们只是想着怎么扩大地盘，顾不过来这些而已。

黄：那时候的政治氛围也不怎么复杂吧？

何：那时候学校里还是自由散漫的。后来到了小学三年级，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国民党开始专政，党是领导一切的。形势就开始不同了，政治和思想的领导就开始渗入到学校里面来。比如说，我们每个星期一的早晨第一节课就是总理纪念课，我们都要背总理遗嘱，所以总理遗嘱我现在都能背下来。因为每个星期都要背嘛，所以我现在可以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何老笑了起来）。

国民党谈不上民主，是一党专政。比如说：五四运动如果不是发生在北洋时期，而是在国民党时期，情况一定不同。五四运动实际上是文化知识分子的一场思想文化革命，那时候是军阀专政，但并没有直接干涉，如果是国民党时期，那是不可能的。到国民党时候就变成了一党专政了，那时公开宣扬，国民党是领导一切的。所以到处都有党部，比如有北京市的党部、河北省的党部等等。党部是很起作用的，但在北洋时期，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党部主要就是贯彻党的教育。按孙中山的理论：中国革命要经历三个时期——第一个叫军政时期，第二个就是训政时期，第三个才是宪政时期。军政就是要用武力来镇压，这是学习苏联的，因为苏联建立了红军，所以他们也建立了国民革命军，连八路军也是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那时候是一党领导的军队。随后是党化教育，北洋时期没有这样一个阶段。

黄：孙中山提出的“训政和宪政”，你们那个时候有没有经历过呢？

何：我们那时是训政时期。军政时期是武力统一，但是统一之后国民的能力还不足以执政，所以就要训政。群众没有政治知识，所以一定要先训练，训政就是由国民党来教育民众，训练群众，等到民众觉悟了，有了一定的知识之后，再颁布一个宪法，这就进入了宪政（也就是民主）时期。所谓宪政就是有一部宪

法，依照宪法来治理国家，是民主政治。训政时期就是前民主政治。可是实际上，训政时期一直没有结束，始终都是在训政，所以后来搞民主运动的时候，就成立了好多“宪政促进会”，《毛泽东选集》里面就提到过。

黄：中国不能实行宪政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缺少个人主义的东西？

何：我觉得这一点是唯物的，因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没有这样的基础，落后的农民只希望有个好皇上就行了，没有“我是主人，应该当政”的想法，落后的农业国家没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只要求领导者好一点就行了，像有的东北人还怀念张作霖，说张大帅很好。

李：听说当时东北的生活水平比别的地方也要好一些，就是因为东北比较统一？

何：东北没有经过内战，始终是张作霖统治。因为一旦打起仗来损害总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在华北、华中这些地方都是很多军阀，很多山头，如吴佩孚、阎锡山等等，打起仗来损害是比较大的，东北比较富的原因也是因为战事较少，生产力破坏要少一些，所以东北有人怀念张大帅，说张大帅很好。

战火纷飞的年代，辗转的中学生涯

黄：你读初中的时候是在北京读的吧？那个时候的时局怎么样？

何：那时候学习还很正规。但是解放之后，反而把正常的学习给打乱了。包括我们参加工作以后也是，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科学院的历史研究所工作，但很少真正地搞业务，基本都是在搞政治运动。运动一来，便压倒一切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使是在搞业务的时候，也不是真正地在搞业务，因为那个时候是政治挂帅，假如说要批判什么人，大家都一窝蜂批判，不是真正在做研究，而是先给一个既定结论。这个跟科学研究不一样，科学研究不允许先有结论，结论是研究的结果。而运动是先有结论，所谓批判就是所有的研究都是要为这个结论服务。那不能算是科学研究。

黄：您读书读到哪一年抗战开始的？

何：我刚读完高中一，那一年的暑假，7月7号卢沟桥事件之后，就正式打仗了。我老家在湖南，但我是在北京长大的。打仗之后就回湖南岳阳老家了。和平门北京师大附中的很多同学还留在北京，中学毕业后他们很多人绕到后方，上了西南联大。我也考上了西南联大。老同学见面聊天，我问他们：“日本人来了以后，你们改学日文。学了两年日文，应该学得不错吧？”他们说：“没有，我们连字母都不认得。全班没有一个人学日文，上日文课的时候大家都不听，考试全班都考零分，作为一种抗议吧。”

黄：那时候的学生真有骨气。

何：7月7号卢沟桥开始打仗，7月28日日本就占领了北京。8月13日日本开始对上海动手了。上海“八一三”的规模很大，当时上海国民党总共有几十万

军队，牺牲真是太大了。要从作战的角度来说，是得不偿失，日本有空军，国民党没有，日本有海军，国民党也没有。而上海正好是在海口，日本的海军来封锁，空军来轰炸，而中国的陆军还没有机械化，张治中在战场上指挥还骑自行车。牺牲太大了。可是从政治上来说是有收获的，因为它打出了中国的士气。

李：当时国民党抗战的策略合理吗？最初鼓舞士气，然后放弃华北大片地区养精蓄锐，倒是挺符合中国国情的吧？

何：当然应该是这样，《毛泽东选集》里面也有，以弱势军队对抗强敌的话，应该是打得就打，打不赢就走。如果以弱势军队去和强势军队硬碰硬的话不就是白白牺牲吗？日本人只是沿着铁路线打，那是它的优势所在。其实广大的农村没有被占领，所以广大的农村依然是中国人的地盘，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在发展这些区域。日本人占领铁路线，好用兵。中国那么大，如果每个村庄都去占领的话，他要用多少人啊？他也没那么多人去占领。你看样板戏里面《沙家浜》，那都是在敌后，也就是说在日本人的后方，那还是中国人的地方。

黄：那您是回湖南后参加考试然后考上西南联大的？

何：我不是在湖南考的。那时候上海南京沿海地区都撤退下来了，南京有一个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中央大学搬到重庆去了，它有一个附中。清华、北大、南开就变成了西南联大，中央大学附中搬到湖南长沙，我就入了那里，后来武汉也被日本人占领了，所以学校又搬到了贵阳，我就是在贵阳念的最后一年中学，然后考入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与清华最初的那段酸甜苦辣

黄：考上西南联大，是您和清华的最初结缘。您考上西南联大之后好像换了4个专业是吗？

何：对，那时候没有目标。旧社会和新社会有所不同，新社会是计划经济时代，培养人才也是有计划的，旧社会没有计划经济，所以没有培养人才的计划，不过当时也有些人有具体的目标，想学什么就确定学什么。也有些人像我一样，自由散漫，年轻的时候没想过将来要做什么。

黄：我也是转系生，您怎么看待转系呢？您读大学最初读的什么专业呢？是土木吗？

何：应该是开放的，因为那时候毕竟还年轻，还没有目标。十几岁根本就不知道专业是什么。最初是土木，工学院一年级都是基础课，是不分专业的。所有的大学一年级都上公共课，不分系，到了二年级才入系。二年级我就入历史系了。当初根本就没有专业方向，那时候工科好像很吃香，所以报名就报了工科。但是那时候世界大战就开始了，那时对于世界大事也是很关心的，所以就想了解人类的命运，我觉得读历史会有帮助，就读了历史。

黄：您在西南联大修读历史的时候，你们怎么获取信息呢？

何：有报纸杂志，而且国外的报纸杂志也有，倒是跟解放之后很不同了，解放后看不到的，那个时候可以看到。还有图书馆，离我们学校不远，就有个英国新闻处，里边有个图书馆阅览室，都是英国的出版物，包括报纸杂志，我们可以随便进去看，所以并不是太闭塞。

抗战以前，我在北京读高中，稍微开了一点窍，那时候就去北京图书馆，报纸杂志都是非常丰富的，都是公开的，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我读高一那年，是知识来源最丰富的一年，因为资料那么多，但是打起仗来之后就比较少了。

黄：历史系毕业之后，您又去干什么呢？

何：读外文专业的研究生。因为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最初是读哲学，但只有一个多月就病倒了，生活太苦了，肺病非常流行，我也得了肺病，吐血吐得非常厉害，走路都走不动。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读，第二年我就转读外文系了。

黄：你在西南联大时期，研究生是读两年吗？

何：研究生是2—3年。算起来我在西南联大一共读了7年。

黄：这7年当中，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些什么事呢？

何：一个是世界大局的变化，那时候正好是世界大战的时期，我们仅仅就是靠一点精神的力量，物质是非常贫乏的，吃饭都吃不饱。那时候年轻，总觉得，中日战争以及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将是个美好的世界，怀着这种美好的希望活下去，后来年纪大了这种希望就消逝了。人是靠什么活下去的？是靠着希望活下去的。那时候就觉得战争之后肯定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包括中国，包括全世界都是。生活就靠这个精神支持。

黄：当时西南联大的校舍是新搭的还是用的旧的呢？

何：新盖的。条件真是苦极了，墙是夯土的，没有砖，屋顶是茅草的。窗子是有，但是没有玻璃，就是用几根树枝插在那里作为形式，是透风的，幸亏我们是在昆明，四季如春，冬天不太冷，夏天也不太热，下雨之后就雨过天晴，气候非常好。如果不是因为这么好的气候，我想死的人会更多。那时肺病非常流行，很多非常优秀的同学就是死于肺病。

当时就抱着一种美好的愿望，就觉得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之后不仅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中国，还有一个美好的世界等着我们。这是最大的精神支持。

黄：当时有没有想要走向前线，去抗敌救国？

何：当时很多同学都是这样，去了几年又回来读。而且后来到了“二战”的后期，1944年或者1945年的时候，当时美国参战了，美军来华需要大量的翻译，所以大量的男同学就被征从军去了。当时我没有去，因为我已经毕业了，去的都是在校的本科生。

黄：你们当时毕业了都去干吗呢？

何：当时绝大多数的同学都是去做中学教师，我也做过中学教师。因为做了中学教师，总有报酬，虽然报酬不高，但是总可以改善你的生活，能够吃得饱了。大概我们都是到了三、四年级就去外面兼课。也有个别同学到外县去做个全